



海峡文丛「方彦富 主编」

H A I X I A
W E N C O N G

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

刘小新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HAIXIA WENCONG
海 峡 文 丛

方彦富 主编

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

刘小新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 / 刘小新著. —镇江 :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1.5

(海峡文丛 / 方彦富主编)

ISBN 978-7-81130-221-9

I. ①华… II. ①刘…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3080 号

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

丛书策划/芮月英

丛书主编/方彦富

著 者/刘小新

责任编辑/顾正彤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0890

传 真/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mm×1 240mm 1/32

印 张/11.7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221-9

定 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前言

这本小书是笔者参与华文文学讨论部分文字的结集。20世纪90年代初,因一些偶然的机缘,笔者开始介入一个新领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迄今已有了一段日子,也积累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或稚嫩或直率,但大多有所感而发,记录了个人阅读各种华语文本时的感想与体会,同时也表达自己参与这个新兴学科建设的热情与期许。这些文字的写作曾经得到不少学术前辈的指点,也受到一些海内外同行的批评与鼓励,这里首先要表达的是笔者对学术前辈和同行诚挚的敬意!

集子中的多数篇什已经发表于各种报刊,依据内容,笔者将稿子概略地分为以下几辑:

第一辑“多元视域与文化诗学”,主要记录笔者对华文文学批评的体会与思考:(1)世界华文文学无疑是复杂多元的,任何单一的理论视域和学术路径都难以涵盖其丰富性。无论“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还是“族性的华文文学”,抑或是“个人化的华文文学”,都是认识华文文学的维度。它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对立和对抗关系,而是可以共存互补的,它们共同构成华文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2)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华人文化诗学”,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华文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根本路径。(3)全球华人的“共同诗学”/“大同诗学”的理论想象或“一体化”的想象必须建立在由多元“地方知识”的辩证对话所形成的交互普遍性的基础上。

第二辑“文化属性与后殖民批评”，主要讨论华文文学的文化属性问题和后殖民阐释实践。“文化属性”是华文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存在原生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重大分歧。对此笔者倾向于非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文化属性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文化属性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文化属性建构是充满矛盾张力的漫长历程，由文化情感和生存策略交织而成；由差异所带来的文化张力或许正是华文文学的丰富性和魅力所在；文化属性建构没有终点，文化属性建构就是对文化属性的恒久追问。与此相关，后殖民批评在处理文化属性问题时的理论与策略被广泛引入到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成为华文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后殖民批评深刻地触及了华文文学研究面临的一系列重要理论与现实命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思想的盲点与批评的偏至。本辑还尝试引入“承认的政治”概念讨论华文文学书写的文化政治意义。

第三辑“现象、思潮与文学史”，主要分析马华文学、美华文学、泰华文学等国家或地区华文文学的现象、思潮与文学史问题。一些文字比较具体，也较深入一些，另一些篇什则是概观式的。

第四辑为“知性与感性”，这个小辑选入了几篇关于华文作家作品的评论小文。这些小文写于多年前，涉及几个华文作家文本的“知性与感性”之呈现方式。

第五辑为“海峡文化与华文书写”，内容涉及“海峡文化”概念的历史建构、“海峡文化”研究的当代性以及华文书写与海西文化传播的关系等等。

现今，华文文学研究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术领域，无论是研究方法的探索，还是阐释理论的建构，抑或学术视域的类型与开放，等等，都存在着丰富的可能性。这是华文文学研究的魅力、活力和潜力之所在。但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比较清晰的学术史脉络，相对于学术传统深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门槛没有那么多高。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华文文学研究显然存在诸多困难。海外华文文学本身处理的是海外华人的经验与问题，因为我们不在文化现

场,没有文学的现场感,要获得某种感同身受的体会和论述的历史感显然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在场,要找到我们自身的文化问题和华文文学的问题之间的交汇点也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在现场,要形成有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和有效的阐释框架殊属不易。这本小书只是笔者阅读一些华人文本的感想和杂记,一些文字是初入这一领域的产物,不当与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华文文学阐释的多元视域》、《解读“文化的华文文学”论争》是我和刘登翰先生合作的成果,《海外华文文学的后殖民批评实践》和《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是与朱立立女士合作的产物,《“海峡文化”:探索与创新》是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的命题作文,与黄育聪博士共同完成。这本小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感谢我所服务的研究机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我庆幸自己能够在这个集体所提供的良好的人文学术环境中工作!也要感谢江苏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辛苦工作!他们的认真态度和高效率令人难忘。感谢朱立立女士和刘舒源同学,对我而言,他们的爱与帮助至关重要!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辑 多元视域与文化诗学

华文文学阐释的多元视域 002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 016

——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大同诗学想象与地方知识的建构 026

——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路径及其整合

从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 035

文化视域、批评介入与华人文化诗学 042

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056

第二辑 文化属性与后殖民批评

文化属性意识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 066

海外华文文学的后殖民批评实践 078

——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中心的初步观察与思考

解读“文化的华文文学”论争 092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099

当代马华文学思潮与“承认的政治” 110

第三辑 现象、思潮与文学史

“黄锦树现象”与当代马华文学思潮的嬗变 120

- 从方修到林建国:马华文学史的几种读法 129
- 马华旅台文学现象论 138
- 世代更替与范式转换:马华文学发展考察 150
- 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管窥 161
- 当代马华诗歌的两种形象 170
- 解构与遁逃:马华新世代诗的一种精神向度 180
- 原乡意识的变迁 188
- 留美学生与“文学革命”的酝酿 194
- 白璧德与20世纪初留美学生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 206
- “白马社”的文化精神与诗歌创作 221
- 草根意识与历史叙事 237
- 以旧金山华人作家群为中心
- 论泰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总体特征 248
- 1980年以来的澳门华文文学掠影 261
- 澳门女性文学面面观 272
- 重新认识“抒情诗的社会学”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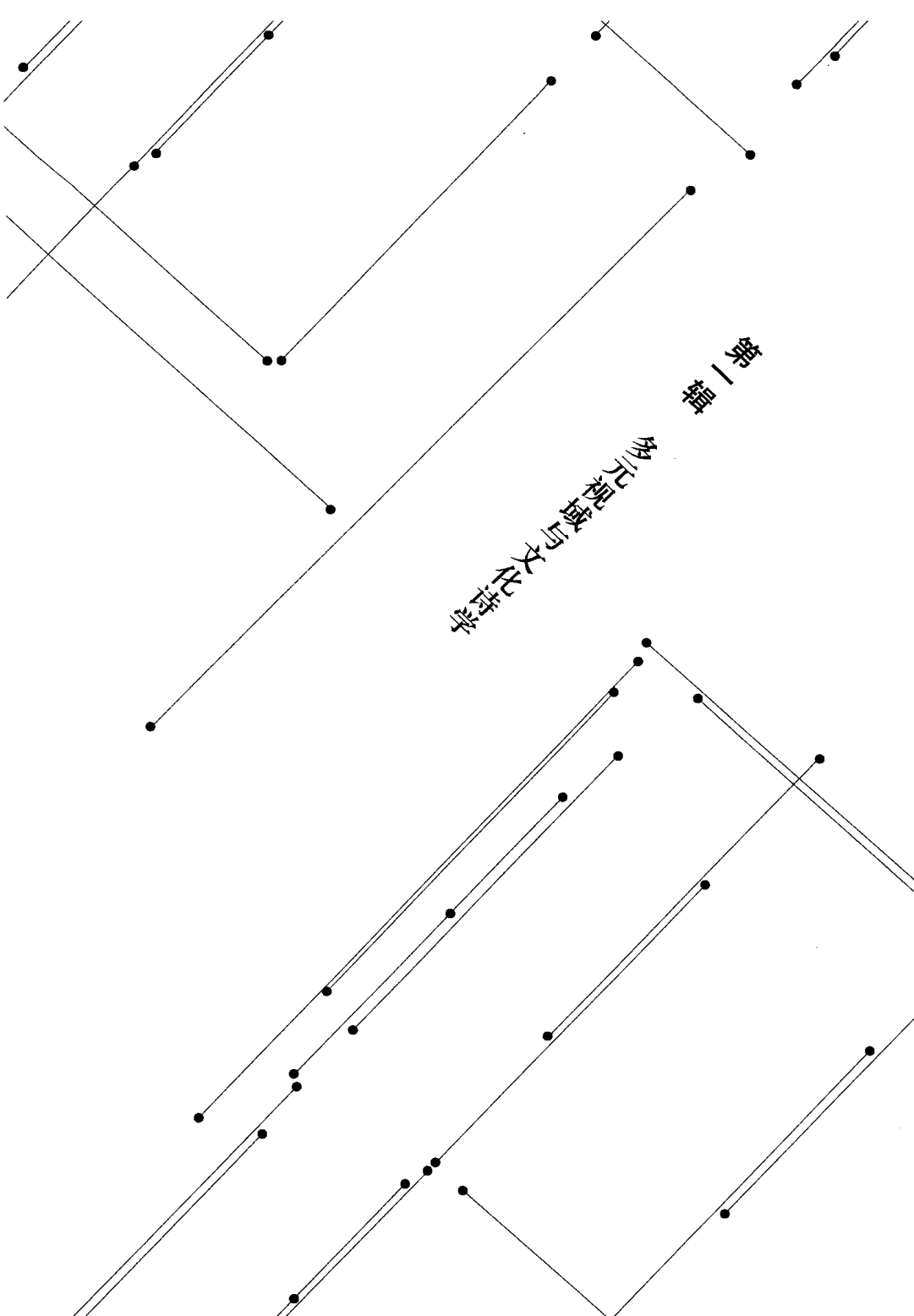
第四辑 知性与感性

- 海外文界的异数:马华作家林幸谦创作论 288
- 黄锦树的意义与局限 298
- 董桥散文的感性与知性 310
- 洛夫诗中的思致和情趣 318
- 余光中散文的诗性与语趣 324
- 从素朴的乡村抒情到抒情诗的政治学 330

第五辑 海峡文化与华文书写

- “海峡文化”:探索与创新 338
- “海峡文化”研究的当代性 349
- 华文书写与“海西文化”传播 355
- 刘登翰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 363

第一編 物理學史的發展



华文文学阐释的多元视域^①

有关华文文学命名及其诠释的意见不一,由来已久。华文文学这一命名的正式提出,始之于1993年在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前的五次研讨会,都以“台港(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名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芃子教授在回溯这一命名的变化时说:“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加温,华文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经过充分酝酿,发起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筹委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在大陆学界出现,即:要建立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无论从事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从事本土华文文学研究都应当有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因为世界各国多姿多彩的华文文学向我们昭示,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应该加强这一‘世界’的内部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体来考察和推动。”^②

这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华文文学研究界对自己学科命名的基本认识。在饶芃子教授的诠释里,我们注意到两点,首先,华文文学是作为一个语种文学的概念突显出来的,以求使已成为世界性文学现象的华

① 本文与刘登翰先生合作完成,原题为《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

② 饶芃子:《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备经过及学科建设概况》,见陆士清主编《新视野 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文文学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等相并列,这是华文文学命名形成的学理性基础和动机;其次,强调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整体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联合世界范围华文文学的研究力量,彼此协调合作,进行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和分析研究,在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起点,创造新的未来”。^① 这是华文文学命名的功能性意义。毫无疑问,华文文学观念的提出,较之前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是学科建设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认识跨越。

然而,这一以语种为认识基础的华文文学观念,在后来的讨论中,由于诠释的不一,也由于视野和认识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受到了一些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2002年2月由汕头大学四位学者引发的那场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他们直指“语种的”华文文学,历数其所带来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弊端和罪过,企望以实际上是建立在生存和生命哲学基础上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取而代之。^② 其二是在海内外诸多论文中不断有人提出的“华人文学”的概念,以避免华文文学语种限定所带来的局限。这可以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教授在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行的海外华人文学研讨会提出的论文《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为代表。^③ “华人文学”论的提出并不全盘否定语种的华文文学,而是鉴于海外华人和华裔非华语写作的普遍存在和客观影响,不满语种的华文文学摒弃海外华人非华语写作的狭隘性。但这一命名的提出,其将涉及的华文/华人文学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潜在论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平心而言,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草创性,使我们对自己的研究视域和命题常常存在许多不成熟甚至偏颇的诠释,即使一些企图弥补其不足的对于某些元命题的批评,也是如此。因此,在华文文

① 饶芃子:《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备经过及学科建设概况》,见陆士清主编《新视野 新开拓——第十二届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吴奕铸、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见《文艺报》2002年2月26日,“华馨版”。本文对“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这篇文章。

③ 全文载加拿大华裔作家作品选《白雪红枫》,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出版,2003年,第281页。

学的学科建设上,对于某些基础性的概念进行必要的学术性清理显得特别重要。本文围绕学科性质所将讨论的几个相互对立或关联的概念,如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等,即是出于这一目的,希望通过概念的厘清与评议,有助于对自身学科的认识。

一、关于“语种的华文文学”

这一概念的形成已久,几乎约定俗成地伴随着这一学科从诞生到发展的大部分进程。但再次引起人们对其命名意义和学术内涵的重新审视,则是在“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对其提出的尖锐批评之后。

从逻辑上看,“语种的华文文学”是一个语义重复的表述,因为“华文”就是语种。但为什么长久以来华文文学研究界能够容忍这种语义重复,甚至对这一“语种”的限定充满热情,乃至将“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研究”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其中必有更为深刻的缘由。

概念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一种抽象,其功能是用来阐释历史经验和回答现实问题。从客观上看,华文文学是跨越国家文学疆界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书写现象。这种散居的、跨国的汉语书写,与英语书写、法语书写、西班牙语书写等都是相似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的越界已成为一种大趋势,语种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文学全球化的一个鲜明的表征。因此语种文学显然比以往更有纳入文学研究概念家族和阐释视域的学理依据和讨论之必要。特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了自己的世界视野,并且更多地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留学热和移民潮,日益频繁的经贸关系和文化往来,都使华文文学在“汉语热”的世界性升温中获得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这是华文文学这一学科产生的现实基础。在华文文学之前缀以“语种”的前置词予以强调,无非是为了突出其与其他世界性语种文学相并列的意义,其良苦用心是为长久以来处于弱势的华文书写争取一份平等的地位。

因此,“语种的华文文学”尽管从逻辑上看是一个语义重复的概念。但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一,“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为华文文学学科划出了其研究对象、范围,提出了学科的论域和全球性视野。它以汉语书写与想象为纽带建构了一种文学共同体(有学者称之为“文学联邦”或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尽管也许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基础。

第二,“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具有一种文化战略的意义。韩国华文作家许世旭指出:“英、法、德、西、俄等语种文学,能够跨越的机遇,是靠他们自己的现实条件和文化背景。他们除了拥有过殖民人家领土的统治经验与贫富人家生活的经济力量,还有拉丁、斯拉夫、日耳曼的悠久文化,才能拥有强势语言,这是曾经掌握过政治殖民主义与经济资本主义的结果。以英语文学为例:盎格鲁、撒克逊,早已攫取了殖民地,来占据统治地位,又以经济、军事、科技的力量,来取得领先地位,自然使英语越出英国国境。以英语作为母语的英、美、加、澳等国的3亿4千万人口之外,以英语作为国语的达20多个,又以英语作为共同国语的也达20多个国家,已遍及非洲、亚洲、大洋洲等。至于法、德、西、俄语等之强势,远不及英语,其中西班牙语普及中南美诸国与部分美国属领,法语用到非洲诸国与加拿大的若干地区。这些强势语言,仗其政经力量,占着优势,而弱小国家把它当作范型,显示出文化附庸现象。”^①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鉴于全球化出现了英语独霸的趋势,危及世界语文与文化的多元性”,^②于1999年决定将每年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以促进世界语文的多元化和多种语文教育。汉语在世界的传播是移民的结果。移居海外的华人运用母语建构自己的族群,但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西方语言霸权和所居国语言主导地位面前,汉语(华文)是一种弱势语言。强调以“语种”概念作为基础的“世界华文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抵抗西方强势文学与语言霸权的意味,使具有悠久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的华文文学,真正崛起并融入

① 许世旭:《华文文学希望跨越民族界线》,《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

② 吴俊刚:《你的母语是什么?》,《联合早报》,2004年2月21日。

世界文学大家庭,进而形成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的合理秩序。

第三,“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中包含着一种对母语的自然情感,而对母语文学的天然情怀无疑构成华文文学深沉厚重的情感基础。散居海外的华文作家对母体的回归是一种文化的回归,而语言便承载着这一母体文化的深沉意蕴。严歌苓在《母体的认可》一文中谈到:“在异国以母语进行写作,总使我感到自己是多么边缘的一个人。而只有此刻,当我发现自己被母语的大背景所容纳、所接受;当我和我的语言母体产生遥远却真切的沟通时,我才感到一阵突至的安全感。……我无论怎样走,走多远,总会回头,去寻得一份关照,寻得来自母体的认可。”^①的确,人们通过语言的书写拥有了一个世界。“母语的大背景”无论如何都是华文文学不能遗忘的文化与审美之维,这是形成与维系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文学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华文文学学科建制与知识生产共同体的基础。

毋庸讳言,“语种的华文文学”有其先天的局限。语种的限定/界定显然使大量存在的华人华裔非汉语写作的作品及其文学现象,远离华文文学的研究视域。这也正是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在其《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论文中所特别感慨和强烈呼吁的原因。梁氏以美加为例,列举了从20世纪初加拿大华裔作家水仙花(Edith Maude Eaton, 1865—1914)到20世纪末的哈金,一百年来华人作家大量非汉语写作的存在情况,指出这是与海外华人作家华文写作并存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在移居国,“被认为是属于边缘性的制作,可是,他们的边缘性却成为华裔发声、自我肯定、反抗强势控制、重建本身族裔历史的场域”。^②2002年11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行的“开花结果在海外——海外华人文学研讨会”上,澳大利亚华人诗人、学者欧阳昱甚至提出了“告别汉语:21世纪新华人的出路?”这一命题,他详细地论述了华人及其子裔在海外的生存境况。为了谋生

① 严歌苓:《母体的认可》,《中国时报》,1998年3月30日,第37版。

② 全文载加拿大华裔作家作品选《白雪红枫》,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出版,2003年,第285页。

也为了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必须放弃母语,掌握和运用所居国语言的现实,使得“告别汉语”成为21世纪新华人、也是21世纪新华人的海外写作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的确,许多年来华文文学研究很少关注非汉语书写的文学,这一忽略或忽视显然令人遗憾。它影响了我们对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完整认识和整体阐释,同时也使华文文学的研究丧失了可供参考的维度,以及一系列饶有趣味的跨文化的研究课题。华文文学研究对非汉语写作的漠视,一方面是受制于目前大多数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外文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本身的囿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屡有关于“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的争论,便是对“语种的华文文学”学科观念本身局限性的质疑。争论虽然未有结果,但它关涉到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能不予以重视。显然,打破华文文学研究自设的“语种”框限,开放边界,把它的批评视域和研究范畴向非汉语书写的文学经验扩展,已是必不可免了。

二、关于“文化的华文文学”

“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是汕头大学四位青年学者在一篇引起争议的论文中提出来的。“文化”是一个有着太多语义的概念。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华文文学,或者阐释华文文学的文化内涵,即近年来颇为热闹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这是早已有之,并成为华文文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但这并不是“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的本意,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针对“语种的华文文学”而来的。当论者对“语种的华文文学”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与之对抗,并企望用以代之时,论者在这里使用的“文化”这一用语,就有了具体、特定的学术语义,其所引起争论的尖锐和对立,便也不言而喻了。

现在这场争论已经事过经年。我们可以离开当时争论的特定语境,重新审视这一观念提出的是是非非、论者的初衷与不足了。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这一概念的出场意味着新生代学人对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满与焦虑。他们企望从基本的

研究理念出发,寻求学科建设和华文文学批评的新路线——从对华文文学学术史批判性的思考开始,建构华文文学研究新的知识图景。这种良好的意愿当然值得嘉许。事实上,“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的确也发现了我们以往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和困境,那就是对世界华文文学共同性的高度重视与过度阐释,以至于忽略了华文文学的具体性和独特性。许多迹象表明,人们对华文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主义,缺乏某种必要的自省意识,更没有认识到普遍主义的限度。因此,当“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强烈呼吁“华文文学研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对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的生命、生存和文化的原生态的关注上。这就是我们所属意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要义之所在”时,“文化的华文文学”论的价值和意义就真正显示出来了。显然,他们是在生存方式和生命表现的意义理解和使用“文化”这一有着如此众多涵义的概念的,而且把华文文学对华人生存境况和生命形式的表现、再现、记忆与铭刻,视为华文文学研究至关重要的学术任务和重心。这显然不同于以往偏重于讨论与揭示华文文学中华性意蕴的研究理念和学术思路。这一提示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多样化视域的形成,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曾提出华文文学研究的“分流与整合”的思路,在这个架构中我们特别强调对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体的华人不同的“文化与生存境遇”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同情和重视。的确,在追求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对文学分流及其形成分流的诸种个性化、历史性和脉络性因素予以充分的关照。唯有如此,整合研究才不至于牺牲如此复杂多元的异质性元素和独特的生命形态。因而,辩证地处理“分流”和“整合”、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应是华文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题中之意。

由是,我们说过:“文化的华文文学”是个有价值的命题。无论是从文化研究的意义,还是从作者所认定的生存与生命哲学的意义来界定这个“文化”,都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当论者把“文化的华文文学”和“语种的华文文学”对立起来的时候,就流露出该文在立论上的浮躁和妄断。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重要体现,那么从逻辑上看,“语种的”华文文学和“文化的”华文文

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更不形成对抗,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构和互补的关系。当论者硬是把二者对立起来时,这一观念提出的背后便隐含着一个错误的判断,即认为长期以来,在“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支配下的华文文学研究,缺乏对华文文学自身拥有的“独立自足性”这一“本质属性”的认识,而是一厢情愿地将华文文学依附在“语种的”总体性之中。用他们具体的语言表述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首先将华文文学作为文化学存在的本质内涵托付给华文文本的(传统)语言学表象,进而凭借汉语言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常识性联系,将华文文学存在的自身独立性交给中国文化。这样,华文文学事实上成了后者的附庸。”这一论断值得注意的是,论者把华文文学的汉语写作,仅仅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操作性工具”,而由这个“被幻想出来的广大无边的汉语言世界”所主导的“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的内涵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追求”,其性质是“语言之种类与民族主义合谋的结果”。这样的批评显然是片面和不切合华文文学研究实际的。我们在《都是“语种”惹的祸》^①中曾有所分析,这里不赘。它导致一个吊诡:以“独立自主性”作为自己核心观念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其最终指向却是反文化的——反对被视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中华文化。判断的错误导致性质的严重就在这里。这一不实的指控引起轩然大波就很必然。其实,这一对华文文学“独立自足”的本质认定,仍然只是一种有着本质主义嫌疑的抽象论断,而不是从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经验出发得出的。相反,以语种为基础的世界华文文学观念,虽然也是一种想象的总体性观念,但却有着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依据。汉语书写并非是华文文学没有实质意义的语言表象,语言以及语言背后携带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必然影响着文学书写美学选择和经验的再现方式。虽然对它的过度强调,有可能忽视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体的华文文学某些异质性、特殊性因素的不足,但绝不是“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所危言耸听的具有“浓重的、不甚友好的族群主义味道”的“文化民族主义”。

① 全文载《文艺报》,2002年5月14日,“文馨版”,又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